古典戏曲中李杨爱情的视角嬗变

蔡德莉
(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四川广元　628017)

[摘　要]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极具代表性的经典题材之一,长期为历代戏曲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但是,在不同时代的戏曲作品中,叙事表达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以唐、宋、元、明、清各阶段的李杨爱情题材经典戏曲文本为核心研究材料,依托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系统梳理该题材自唐代至清代的叙事发展与流变脉络。文章逐层剖析不同时代背景与社会语境下,李杨爱情叙事从政治讽喻主导逐步转向人性情感书写的视角变迁规律,同时深挖时代思潮、文化风气与文学审美变革等因素,探究这一叙事视角嬗变的深层文化动因。

[关键词]李杨爱情;政治讽喻;人性书写;艺术重构;古代戏剧
[中图分类号]I207.37;I23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711X(2026)20-0196-03
doi:10.3969/j.issn.2096-711X.2026.20.064　　[本刊网址]http://www.hbxb.net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历时八载的安史之乱正式落下帷幕,曾经盛极一时的盛唐气象彻底消散。战乱过后,历代文人也在不断回望这段由盛转衰的特殊历史,其中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情爱际遇(下文简称"李杨爱情")更是成为文人吟咏与创作的核心焦点。从元代白朴的《梧桐雨》到清代洪昇的《长生殿》,诸多戏曲作品均以李杨爱情故事为核心题材,在戏曲舞台上不断重塑和演绎。由于时代背景与创作语境的差异,不同时期的文人对这段情缘的解读各有侧重,有的以史家视角立足社会时局与历史变迁,审视李杨情事背后的时代症结;有的以文人视角聚焦故事本身,挖掘其中蕴含的情感内核与人文意蕴。

一、政治讽喻视角:唐宋元时期的道德训诫书写

历代正史中对李杨爱情的记载带有鲜明的政治化叙事色彩,相关内容主要收录于《旧唐书》《新唐书》等官方典籍。传统史家大多以"女祸论"为核心叙事基调,将杨贵妃塑造成为典型的"红颜祸水"形象,着重渲染其恃宠专权、骄矜善妒的特质,刻意弱化玄宗与杨贵妃之间的情爱本身,重点凸显帝王耽于美色所引发的一系列政治弊病。《旧唐书》有载:"开元已来,豪贵雄盛,无如杨氏之比也。玄宗凡有游幸,贵妃无不随侍,乘马则高力士执辔授鞭。"足以见得,史家将王朝动荡的部分罪责归咎于帝王的宠溺和偏私。相较于旧史,《新唐书》对杨氏一族的权势盛景记载更为细致:"天宝初,进册贵妃。追赠父玄琰太尉、齐国公,母封凉国夫人。叔玄珪光禄卿,宗兄铦鸿胪卿,锜侍御史,尚太华公主。主,惠妃所生,最见宠遇。而钊亦浸显。钊,国忠也。三姊皆美劭,帝呼为姨,封韩、虢、秦三国,为夫人,出入宫掖,恩宠声焰震天下。每命妇入班,持盈公主等皆让不敢就位。"(《新唐书·后妃传》)在该记载中,以"声焰震天下"来形容杨氏家族煊赫的权势,通过"持盈公主让不敢就位"的细节,暗示其权力甚至凌驾于皇室宗亲之上。这种"外戚干政"的叙事,无疑是将杨贵妃的受宠与朝政腐败直接关联,较之于《旧唐书》更具道德批判力度。由此可见,史家通过选择性记载杨国忠弄权、安禄山叛乱等事件,构建起"帝王纵欲→朝纲紊乱→国家衰亡"的因果链条,使这段感情沦为印证儒家"戒色戒奢"政治伦理的典型案例,为后世文学演绎提供了史实框架和矛盾冲突的基础。

白居易的《长恨歌》虽为诗歌体裁,却率先奠定了"君王沉溺爱情致使国破家亡"的叙事母题。开篇"汉皇重色思倾国",直接将个人情感与政治危机紧密相连,引发了后世创作者对李杨爱情与政治关联的深入思考。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三首》也对帝妃穷奢极欲的生活进行了讽刺,带有反讽的特色。宋代乐史的《杨太真外传》以唐代正史为骨架,融合《明皇杂录》《开元天宝遗事》等野史传闻,形成"安史之乱—马嵬之变—蓬莱仙会"的叙事框架。其中"贵妃洗儿""霓裳羽衣"等情节,成为了后世戏曲创作的重要母题。这种"女祸论"基调深刻,影响了后世戏曲改编的价值取向。

这种政治讽喻的创作倾向,在元代白朴的《梧桐雨》中发展成较为成熟的戏剧表达。《梧桐雨》以"安史之乱"为叙事核心,通过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构建起"享乐误国"的政治寓言。剧中多次描绘李杨二人的奢靡生活:"沉香亭畔设离宫,辇路生春草"(第一折),极写宫廷宴乐的浮华;"通宵宴,杯酌如川,从者八千"(第二折),借安禄山之口暗讽君臣沉溺酒色;"拆鸾胶,分翡翠,恐他年重见无由"(第三折),将《霓裳羽衣》的艺术追求与朝政荒废并置。这些描写表面上看是延续了传统的"女祸论",实则是将批判重心转向帝王。剧中呈现出来的安禄山叛乱的直接原因是"恨李林甫、杨国忠专权误国",但更深层根源在于唐明皇"倦于万机,政柄尽付宰相"(楔子)。而白朴通过这一因果链,暗合了《尚书》"玩人丧德,玩物丧志"的政治伦理,实则影射元代蒙古统治者耽于游猎、疏离汉地政务的现实,借古讽今之意在历史叙事中若隐若现。

这一时期的戏剧叙事具有鲜明的"道德化政治"特征。这种书写模式既受儒家"乐教"传统的深刻影响,也反映出唐宋以来,在中央集权制度不断强化的背景下,文学主动呼应政治合法性建构的现实需求。

二、人性解放视角:明清时期的世俗化重构

进入明清时期,市民文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愈发兴盛。与此同时,阳明心学思潮广泛传播,打破了传统礼教的思想桎梏,社会审美与文学创作观念也随之发生深刻变革。在此时代文化背景下,李杨爱情题材的戏曲创作实现了叙事内核的重要转型,不再单纯依托历史视角进行政治讽喻与罪责评判,而是逐步转向对个体情欲与本真人性的挖掘与彰显,着力抒写世俗真情、张扬人性自由,使这一经典题材最终形成了贴合市民阶层审美、以情感本位为核心的世俗化叙事范式。

明代传奇作品《惊鸿记》以李杨爱情为叙事主线,采用"梅、杨双妃并置"与"情政互文"的创作思路,形成了独特的

收稿日期:2026-6-5
作者简介:蔡德莉(1986—),女,四川广元人,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研究。

叙事立意。该剧突破了前代作品以杨贵妃为核心的叙事模式,抬升梅妃江采苹为主要旦角,将杨贵妃改为次要旦角,构建起双妃对照的叙事结构。剧中援引"谢女咏雪""班姬却辇"等典故,以谢道韫、班婕妤等贤才女杰对标梅妃,凭借《梅亭私誓》中"谢女休夸好句,班姬正倚新妆"等典雅唱词,凸显其才德兼备的形象。反观杨贵妃,剧本通过"洗儿赐钱""香囊起悼"等情节,刻意渲染其与安禄山的暧昧关系,借《洗儿赐钱》的仪式场景暗讽其秽乱宫闱的行径。同时,剧中杨贵妃的台词多采用市井俚语与民间传说,与梅妃的雅致文辞形成鲜明反差,凸显其鄙俗失德的人物特质。此外,作品颠覆了唐玄宗的帝王形象,将其刻画为耽于情欲的昏君。他面对宫廷乱象无动于衷,罔顾礼法迎娶杨玉环,且在梅妃与杨贵妃之间情感摇摆,充分体现出色令智昏、荒于朝政的君主弊病。该剧表层虽带有劝诫时政、规训世人的创作意图,但整部作品的叙事核心始终围绕着后宫情爱纷争展开,对人情私欲的描摹刻画,远远超出了对政治兴衰的审视与反思。剧中涉及的政治内容,大多只是附着在人物身上的道德评判符号,目的是烘托人物矛盾、丰富两性情感叙事,并未真正形成自成体系、具备思想深度的政治思考。

汤显祖的戏曲主情思想最能体现出晚明时期的时代精神与曲学气质,他对清代曲家的戏曲创作影响很大,其"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核心理念在洪昇的《长生殿》里得到了历史题材层面的积极回应。作品中所描写的李杨婚恋故事以诚挚的爱情为基础,大胆突破前代"女色祸国"的陈旧道德框架,将李杨爱情升华至"问双星,朝朝暮暮,争似我和卿!"这般至纯至真的情感追求高度。在《长生殿》中,创作者通过"密誓""埋玉"等经典场次的细腻雕琢,成功地赋予了帝王后妃以普通情侣般的情感维度。洪昇亦曾自称《长生殿》是历史翻案之作,他认为《长恨歌》《梧桐雨》囿于文体的局限,对李杨爱情及其背后的历史景观未能进行酣畅淋漓的、全景观式的表现。他强调自己在写作该剧时,"史家秽语,概削不书",解释说这样做并非是为古人"匿瑕",而是为了坚守诗人温柔敦厚的传统。

洪昇对前人笔下李杨故事中过多的猥屑描写颇为不满,在他笔下,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杨玉环的形象得以重塑,摆脱了前人叙事中的刻板印象,呈现出更具人性光辉的一面。洪昇对李隆基的形象塑造,主要从感情净化与人格升华两方面着手:在感情净化层面,洪昇摒弃了前人笔记中李隆基引诱虢国夫人、与秦国夫人暧昧,甚至对月中嫦娥心生遐想等不堪情节。对李隆基与梅妃的过往,洪昇也未大肆渲染,而是以侍女的言语侧面暗示二人曾有私会,使得这段关系更显含蓄。在人格升华层面,洪昇隐去了杨玉环曾为寿王妃的往事,避开了李隆基"夺媳"的伦理争议,着力刻画玄宗的勤政、选将等明君形象。这种处理没有简单将个人情感等同于政治失当,而是在保留历史脉络的同时,让李隆基的形象更加圆融。洪昇笔下的杨玉环,也不再是传统叙事中"倾国妖种"的符号,而是一个兼具才情、深情与家国大义的立体人物。她不再善妒阴狠,被逐出宫时会哀怨君心无常,发现李隆基暗会梅妃时会失落怅惘。马嵬之变中,她主动请死,劝皇上以社稷为重,展现出非凡胆识。洪昇让杨玉环跳出了"恃宠而骄"的旧框架,在帝王真情的维度上,赋予了她更人性化的情感合理性。

《长生殿》无疑是中国戏剧史上一朵绚丽的奇葩,曾永义先生曾评价这部作品"寄意之深远、结构之严谨、音律之精审、文辞之美妙以及人物塑造之成功,就戏曲文学史上来说,实堪居于集大成的地位"。这种对"情"的推崇,契合了明清戏曲"以情抗理"的时代精神,让历史故事成为了宣扬人性解放的文学典范。

三、视角嬗变的文化动因

李杨爱情故事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题材,其书写视角从政治讽喻到人性书写的嬗变,反映了中国社会文化、政治环境和文学观念的深层变迁。这一嬗变的文化动因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解析:

(一)政治环境与时代思潮的变迁

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叙事始终与安史之乱的历史变局紧密交织。安史之乱结束后,李杨爱情叙事悄然成为政治反思的文化符号,正如蹇长春所说:"面对苦难现实的中唐人民,特别是对时事敏感的文人士子,当他们渴望的'中兴'终成梦幻,于是抚今追昔,借缅怀'开元盛世'来寄托其盛世难再的叹恨与感伤,便成为一种时代思潮与风尚。"这种文学书写与中唐士人"以史为鉴"的政治诉求深度契合,鲜明地体现了儒家"诗教"传统所倡导的文学干预现实的社会功能,使爱情叙事成为承载政治伦理的载体。

宋代"文人和政治的关系更为密切,文人、官僚、政治家三位一体的现象较历代更为突出",加之理学思想的兴起与强化,李杨爱情叙事便发生了深刻的伦理转向。《杨太真外传》等作品将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女祸论",通过对杨贵妃形象的道德重构,将李杨爱情进一步政治工具化。这种书写策略服务于儒家伦理秩序的建构,使杨贵妃成为了"红颜祸水"的典型象征,其叙事重心也从历史反思转向道德训诫。

随着晚明以降市民文化的勃兴与专制统治的相对松动,李杨爱情叙事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明代中后期,以王阳明"良知"论与李贽"童心"说为代表的思想相继兴起,由此催生出崇尚自然本真、张扬个体性情的思想解放潮流。洪昇的《长生殿》堪称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该剧在保留"乐极哀来,垂戒来世"政治批判维度的同时,以"情悔"作为叙事核心,着力描绘李杨二人在经历生死劫难后的情感救赎。这种创作取向突破了传统政治讽喻的窠臼,在历史叙事中注入个体情感的深度开掘,赋予了李杨爱情以超越政治伦理的人性内涵,标志着李杨爱情叙事从政治工具向人性书写的重要转变。

(二)文学观念与审美趣味的嬗变

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在唐宋以降经历了从伦理本位到情感本位的深刻转变,诗歌、散文、戏曲等领域皆是如此。唐代确立的"文以载道"传统更是在杜甫"穷年忧黎元"的沉郁顿挫和白居易"惟歌生民病"的新乐府实践中达到高峰。这种强调文学社会功利性的思潮使得李杨故事早期书写多停留在"鉴戒兴亡"的政治层面,如陈鸿《长恨歌传》中对"君王掩面救不得"进行了历史反思。明代中叶以降,随着阳明心学"致良知"理论的传播,文学领域掀起了"主情"思潮,"情"可以超越生与死的界限而得到充分的表达,这种将情感视为超越生死的本体论存在的观念,为李杨故事注入人性觉醒的现代性因子。

明清时期悲剧观念的演进也为李杨故事赋予了超越时代的普世价值。元代《梧桐雨》尚带有"兴亡如梦"的历史循环论色彩,而到了清代,《长生殿》在"埋玉""哭像""仙圆"等场次中,将悲剧成因从简单的"红颜祸水"论转向对人类情感困境的哲学思考:当唐明皇在"仙圆"中与杨贵妃"问双星,朝朝暮暮,争似我和卿!"的诘问,实质是对人类永恒情感渴望与现实存在限制的终极叩问。这种悲剧意识的转变,与《红楼梦》"枉凝眉"的悲剧精神形成互文,二者都超越了具体的政治批判,转向对"美为何存在,又为何毁灭"的形上思考。这种从"政治悲剧"到"存在悲剧"的转型,使李杨故事超越了具体的历史语境,成为探讨人类情感本质的永恒母题。

这种文学观念与审美趣味的演进,本质上是中国文学从伦理工具论向审美本体论的现代性转型。当李杨故事从史书中的政治教训演变为舞台上的情感史诗时,其书写范式的

变迁不仅折射出了千年间文人心态的嬗变,更标志着中国文学终于突破“载道”传统的桎梏,在人性深度与审美广度上抵达新的境界。

(三)社会结构与文化权力的转移

在唐宋以降的社会结构变迁中,士人阶层与市民阶层展开了此消彼长的文化博弈。唐代科举制度催生的新型士大夫群体,习惯于将李杨故事纳入政治寓言的阐释框架,他们在《长恨歌》《长恨歌传》等作品中,通过“君王掩面救不得”的悲剧书写,构建起“爱美人误国”的政治隐喻体系,实则是借历史叙事完成对君主集权制度的理性审视,从而暗合士大夫“以史为鉴”的谏言传统与“致君尧舜上”的政治理想。

明清以降,商品经济勃兴催生的市民阶层登上文化舞台,其价值取向对叙事范式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苏州、杭州等地的书商敏锐地捕捉到了新兴消费群体的审美需求,戏班商业化运作更形成了独特的“剧场效应”,明代南京教坊司官班与民间昆班常常以《长生殿·密誓》等情感戏码作为压台戏,通过舞台上的“钗盒定情”“星桥密誓”等视觉化场景,将政治叙事转化为充满感官刺激的“情感奇观”。这种题材转向本质上是文化消费权力转移的表征,市民阶层通过购买戏票、选购话本的消费行为推动李杨故事从士大夫的案头文学演变为市井百姓的娱乐消费品。

在性别权力结构的变迁中,李杨故事成为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文学镜像。传统史书中的杨贵妃始终处于被凝视的客体地位,《旧唐书》仅以“姿质丰艳,善歌舞”的物化描写定格其形象,男性书写者习惯将安史之乱的罪责归于“红颜祸水”。晚明以降,随着才女文化的兴盛,《长生殿·密誓》等情节呈现出突破性的性别叙事:当杨贵妃与唐明皇“问双星,朝朝暮暮,争似我和卿!”的深情对白响起,舞台上的女性不再是被动接受命运的玩偶,而是主动倾诉情感诉求的主体。

从政治寓言到情感奇观,从男性凝视到女性言说,李杨故事的演变轨迹清晰地勾勒出了社会结构与文化权力的转移图谱。这种跨时代的叙事嬗变不仅是文学题材的自然选择,更是不同社会群体争夺文化话语权、重构集体记忆的历史见证,为我们观察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动态提供了独特的文学标本。

四、结语

李杨爱情书写历经千年演变,绝非单纯的叙事转换,实则是中国文化深层结构发生变动的具象投射。这种嬗变的本质,可视为中国文化从“集体本位”向“个体本位”的局部位移,是文学对“人”的发现过程。从政治讽喻到人性解放,再到现代的多元解构,戏剧叙事始终在历史真实与文学想象的张力之间探寻平衡,生动印证着不同时代对爱情、权力与人性的不懈思考。

参考文献:

[1]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第四卷[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200-210.

[2]郭预衡. 中国古代文学史: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3-5.

[3]蹇长春. 元稹评传[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495-499.

[4]郭英德. 书写的历史与历史的书写——读王瑜瑜《中国古代历史剧论稿》[J]. 艺术评论,2020(10):151-157.

[5]朱恒夫. 古今之人喜爱《长生殿》的原因[J]. 四川戏剧,2025(10):6-12.

[6]贺颖. 试析《清平调三首》与《过华清宫三首》诗词特色异同[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0,33(13):189-190.

[7]张丽红. 帝妃爱情悲剧的原型化同构——《长生殿》“钗盒”象征作用的重新探讨[J]. 戏剧文学,2021(12):89-94.

[8]柳慧.《哀江头》两重视角叙事分析及主题初探——叙事视角下切入的曲笔刺政分析[J]. 黑龙江教育,2024(S2):48-49.

[9]李洋. 从《长生殿》看帝王恋[J]. 戏剧之家,2016(14):30.

[10]曾礼军. 中日文化语境中的杨贵妃故事叙述比较——兼论日本对中国古代文学接受的民族性[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88-97.

[11]刘红艳. 古典戏曲中杨贵妃形象的演变[J]. 戏曲艺术,2006(1):60-62.

[12]曾永义.《长生殿》研究(增订本)[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40-45.

[13]柯佳玮. 情爱与政治——历朝李杨故事叙事立场研究[J]. 闽南师范大学学报,2019,33(3):67-71.

[14]赵晋. 汤显祖“至情论”的演绎——以《牡丹亭》为例[J]. 戏剧之家,2021(5):44-45.

[15]曾泽欣. 论诗剧《梧桐雨》的叙事特色[J]. 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22,38(8):34-39.

[16]向芳. 至情理想与欲望博弈——《梧桐雨》《长生殿》情感书写再观照[J]. 艺术评论,2023(2):130-141.

The Evolution of Perspectives on Li-Yang Love in Classical Chinese Opera

CAI De-li

(North Sichuan College of Preschool Teacher Education, Guangyuan Sichuan 628017, China)

Abstract: The love story between Emperor Xuanzong of Tang and Yang Yuhuan is one of the classic them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which has been presented with diverse narrative dimensions in dramatic works of successive dynasties. Taking representative dramatic texts from the Tang,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s research objects,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 of textual interpretation to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the narrative evolution of the theme of Li-Yang love from the Tang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 deconstruct the trajectory of perspec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is theme from political allegory to humanistic writing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contexts, and deeply explore the cultural motivations behind this shift in narrative perspective.

Key words: Li-Yang love; political allegory; humanistic writing; artistic reconstruction; ancient drama

(责任编辑:陈思婷)